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Zhexueshi Fangfalun Shisijiang

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就是要对自己反思，要对自己传统的，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这一套思维模式有一个新的反思。所以，只有从中西哲学思想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比较，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的传统的局限性。

邓晓芒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Zhexueshi Fangfalun Shisijiang

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就是要对
自己反思，要对自己传统的，认为是天经地义、
不容怀疑的这套思维模式有一个新的反思。所
以，只有从中西哲学思想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比
较，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的传统的局限性。

邓晓芒 著

B1-03
DXM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624-4446-6

I. 哲… II. 邓… III. 哲学史—方法论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874 号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 著

责任编辑:陈进 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5 字数:447 千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4446-6 定价:4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知名学者，在我国哲学界、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是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直接从德文全译康德“三大批判”的国内第一人。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重新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了【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正积极建构【自否定哲学】，同时深入开展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思想界独树一帜。



策划编辑：陈 进

责任编辑：陈 进 雷少波

E-mail: cj1980520@yahoo.com.cn

装帧设计：设计工作室



目录 Content

第一讲	
绪 论	1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20
第三讲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46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74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99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130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154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	179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206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232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257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283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314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333
后 记	367

第一讲 绪论

我们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现在就开始了。这个课程是一个传统课程，哲学史方法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们武大哲学系刚刚开始研究生招生的时候就有这门课。当时哲学史教研室很小，包括中哲和西哲，西哲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都是一个教研室。当时是江天骥、萧萧父、陈修斋、杨祖陶，这几位老先生共同在这个哲学史教研室里面担纲，那时就开了这门课。我是 1979 年读硕士研究生，还有上一届 1978 级的和我们 1979 级的在一起，这是我们读的一门必修课。整个教研室，中哲、西哲的研究生在一起来研讨，怎么样看待哲学史的问题，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这个话题好像不太有人提起来了，但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时正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哲学史。说起来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如何看待人类几千年来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和评价人类的精神财富。按照以往的看法，就是在“四人帮”以及以前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的看法，是从前苏联的日丹诺夫那里接收下来的一整套苏式理论、日丹诺夫的理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简单说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最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整个哲学史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当时从前苏联也翻译了哲学史的教材，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哲学观点来贯穿，就是西方哲学史——当然前苏联只能写西方哲学史，它不能写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没有什么哲学史，他们的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史，写到了现代才有了什么罗蒙诺索夫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史。那么在这个哲学史里面呢，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唯物主义线索，一条是唯心主义线索，就是描绘这两条线索是如何“两军对战”的，在每一个阶段不断地在互相斗争，而这种斗争的背后又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哲学史归根结底被看作是阶级斗争史。当时在哲学界和哲学史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样一个日丹诺夫的定义——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哲学思想的发

展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所以当时出版的以及以往出版的好几本欧洲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写的。这个模式表现在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以后，然后就往那些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凡是讲到哲学史，就必须这样写，包括我们的先生，像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写的那个《欧洲哲学史稿》，里面也有这方面的痕迹。当然他们那一本可以说这种痕迹是最淡的。陈先生和杨先生他们特别注重学理的分析，里面有很多思想分析，哲学思想，究竟怎么样争论，有哪些问题，怎么样过来的。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所以在当时流行的好几本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教材里面的，陈先生、杨先生这一本是最具有学术品位的。但是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影响，要戴上一个帽子，一个紧箍咒。

所以当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哲学史教研室的几位老先生深感我们受前苏联的日丹诺夫定义的束缚太深，根本就放不开。你想在哲学史里面谈点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动不动人家就要批判你，混淆了阶级矛盾，混淆了阶级界限。对唯心主义要加以纯学术的评价，那就是抬高了它的地位了。你只能够骂它，不能够评价的。所以，当时那些哲学史著作我们今天要读起来呢，你不能当学术的东西来读，当历史来看还勉强可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碰到唯心主义就骂，碰到不喜欢的就给它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做法。

那么后来，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有的人就想在里面松动一下了。松动了一下，就找到了一条列宁的语录。列宁这条语录是在《哲学笔记》里面谈到：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人类的认识史，这就和阶级斗争离得比较远了。你不能说哪个阶级有认识，哪个阶级就没有认识。这就有一点混淆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了。这样一说呢，哲学史就比较好讲了。讲人类认识，你当然可以讲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讲明白，为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上出了什么问题，就还有一些理论性了。所以当时一个比较松动的提法，就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人类的认识史。这就把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一下子冲掉了。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文本根据。他就是想当然的，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了，他就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所有的问

题都是阶级斗争。思想上的问题不拿到阶级斗争上面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列宁提出来的“认识史”的这个观点,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气,大家纷纷引证列宁这个观点来解释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这就有一定余地了。不过列宁的这个认识史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松动,但是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哲学史怎么仅仅就是认识史?认识史还包括自然科学呀,还有数学,这些也是认识史,那么哲学史跟这些认识史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哲学史还有别的方面,除了认识以外,它还跟道德呀、法律呀、宗教呀、艺术呀、审美呀这些东西都有关系,怎么能够把它仅仅限制在认识这一个方面?所以列宁的这个“认识史”也被人们怀疑,有人,当时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王荫庭先生,经过和俄文本原文的对照,认为这个“认识史”其实是翻译错了的。列宁讲了认识史,但不是讲的哲学史,哲学史是讲的另外一回事情,在排版的时候把它排到底下了,但是按照列宁的手稿,不应该排在那个后面,而应该另外排。所以这个观点在起到它一定的作用以后呢,人们也开始怀疑,就是说,哲学史不能够这样简单地把它定义为或归结为另外的什么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史,你就要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它,你不能用科学的眼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也不能用道德的眼光、政治的眼光把它还原为某种别的东西。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的,我们在座的了解情况可能觉得很奇怪,包括我们哲学系,当时一大批老先生,当然他们中有些人学问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思想始终受到禁锢,非常敏感,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政治敏感性”嘛。一个人失去了政治敏感性,失去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当时就是一个罪。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就会出来说,你这是抹杀了阶级斗争了,你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了。但是我们那几届研究生进来以后,个个都是有“反骨”的,对于以往的那些东西,甚至是深恶痛绝,觉得思想受这种东西的限制,那还谈什么哲学。我们那两届研究生都是从底下直接上来的,大部分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自己看点书,然后有自己的体会。所以在讨论会上面,大家发言都非常踊跃,都想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一个教室里面二三十人,那简直就很难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逮着一个说话的机会就不断地说,而且一争起来就面红耳赤,就拍桌子,甚至于互相骂起来。当时这种情况非常热烈。老师呢,基本上就是在旁边听,在结束的时候呢就出来做一番总结,做一番调和。因为老师的观点也在不断地开放,也在松绑。当时就觉得我们这几届研究生的思想特别活跃,有的简直超出了老师的意想之外。当时的气氛就是开放嘛,就是要解放思想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打棍子的现象。当时的好几门课,“两史”——西哲史和中哲史的课程有好多,中国哲学史还有原著、经典,西方哲学史也有亚里士多德啊,康德啊,黑格尔啊这些课程。但是,最使人感到激动的,感到兴奋的,就是这个哲学史方法论课。因为只有

哲学史方法论课上,大家不受自己的专业的限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方法论嘛,不单是中哲的方法论,也是西哲的方法论;也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那时也有“马哲”的来听课的)。方法论是可以适用于一般的哲学。而且还不单适用于一般的哲学,适用于一般的哲学了,那就什么都适用了,什么领域,它都可以适用。所以,这是武大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方法论课在别的学校没有,只有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有——后来分成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但是这个课还是合在一起开,还是两室合开的一门课。这一保持了好多年,一直到前几年才分成两门课,就是西哲史有一个方法论课,中哲史也有一个方法论课。这是前几年才开始的。因为随着学科的分化,越来越具体了。而在此之前都是在一起,经常是,中哲主持这个课,也请西哲的老师讲,西哲主持这个课,也请中哲的老师去讲,打破学科的限制和界限。

这个传统在国内只有武汉大学有,也就带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生经过这样的思想训练,毕业出去,人家就发现,武大毕业出去的研究生比较具有理论层次,比较有思想。特别是中哲、西哲的一出去,人家就发现你不光是搞文本的,你不仅仅是读了那几本书,你经过方法论的训练,你有自己的考虑,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材料。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名气嘛,也许是北大、复旦可以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实际上我们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思辨能力方面,在哲学的把握能力、领悟能力这些方面比较突出。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对外交流等方面,可能赶不上他们。但是,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首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哲学方面的素养,这个方面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哲学史方法论课,对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来说,是一个品牌课程。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出过一本《哲学史方法论文集》,武大出版社出的,当时收集了一些老师在上方法论课的时候的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生的文章,大家想要了解的话,还可以到资料室去翻一翻。后来还打算出第二本文集,曾经由我来主编过第二本文集,第二本文集搞了一个打印稿,但没有出版。方法论课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我首先想要跟大家交代的一个历史。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谈很多,不能够进入正题,下面要谈的就算是一个绪论。在绪论里面,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哲学史需不需要一个方法论;第二个是,什么是哲学史的方法论;第三个就是如何学习哲学史方法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哲学史需不需要一个方法论。我记得1996年我们在昆明曾经开过一个会议,是由北大哲学系主持的。当时主持这个会议就是讨论新编一套《西方哲学资料选编》。北大以前出过一套《西方哲学资料选编》,这一套包括好几本,比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北大编的,影响很大,不断地再版,商务印书馆出的。还有一个《中世纪哲学》在计划中,但还没有出出来,可能有一些

译稿,至今还压在老先生的抽屉里面,也许有的老先生已经过世了,就没有搞了。再一个就是《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基本上把近代的西方哲学理了一下,两条线,一个是唯理论,一个是经验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选的也很好,都是经典著作里面的段落。还有一个是《18世纪法国哲学》,爱尔维修啊,狄德罗啊,伏尔泰啊,卢梭啊,这些著名的大家,都有一些著名的代表段落选在里面。还有一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就是讲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段落。这是北大在20世纪60年代所选编的一套书,这在各个大学的老的哲学系资料室里面都有,武大哲学系里面也有,有好几套,影响非常之大,非常深远。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呢,北大的哲学系觉得这套东西已经不够了,因为人们的知识面已经远远不是20世纪60年代可以相比的了。再一个,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也显出当初选编的时候有一些局限性。有些局限希望加以弥补,有些没有收入进去的东西,希望能够更多地收入进去。而有些东西呢,希望能够减少一些。比如说,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对康德的东西比较重视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就有一些忽略。还有一本就是《19世纪俄国民主义哲学》,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些人的哲学文章。当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算不上哲学的经典,希望能够重新编一次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资料》。所以1996年就在昆明开了会,在会上大家就讨论如何编这些资料。

当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照外国人的编法,看外国人在怎么编的,外国人重视什么东西,我们就重视什么东西。这当然很简便了,也能够紧跟西方现代的最时髦、最新的潮流。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我们中国人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因为对于西文来说,不是我们的强项,这个我们绝对赶不上,你搞一辈子,你搞几辈子,你也赶不上人家。人家的希腊文、拉丁文这些东西从小就有基本训练,我们没有这个训练,我们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面不可能超越西方。所以他们主张,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观点,不要有自己的什么看法,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用自己所体会到的某种方法对它加以整理或处理,这都是用不着的,这都是白费力气。过几十年回过头来看,你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无用功,真正能贴近原文的还是西方哲学家,他们搞自己的东西嘛,应该比我们搞得要更精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派观点。这个还表现在资料的处理方面,就是说对资料尽量地不要遗漏,要重视资料的整理,凡是能够在西方造成影响、有定评的,我们就要收进来,不要受任何观点的左右。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们的资料选编也好、翻译也好,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甚至于有意地歪曲,有意地删节,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删掉。至于翻译嘛,好办得很,当时又没有版权问题,我们搞我们的,这句话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把它删掉。现代西方哲学我们涉及很多东西,凡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把它删掉,就当没有这回事。这

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后来呢,就觉得这个太过分了,你还是要客观嘛。这些人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资料工作,就是尽量完整地反映出西方哲学的概貌就够了。

那么另外一派在会上提出的观点认为,还是要有哲学的层次,哲学史不光是历史,它还是哲学。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哲学家,不用说你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都收进来,你搞一个资料选编更加不可能,哪怕你搞一个大全,你都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都收进来。浩如烟海的资料嘛,你怎么可能把它们全部收进来?所以,必须要有选择,而要有选择,就要有观点,就要有自己的取舍。历史上,有些东西风靡一时,过了几年,过了几十年,没人提了。为什么没人提了?它到底有没有价值?现在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比较重视某些人,把他提出来,搞得很热闹,是不是就真的那么重要?你就盲目地相信他们,跟着他们转,过几十年他又不提了,那你也不提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包括我在内,有几个人提出来,哲学史的意义还是在于提高国人的哲学素养。要提高素养,你就不能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一大堆资料的编纂、汇集,而必须要有取舍。你要分得清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对西方的哲学精神具有代表性,这就需要有哲学观点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你如何能够取舍?你如何能够看出,哪些东西具有代表性,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枝节的?比如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当时吹得不得了,跟着前苏联吹,后来前苏联也不吹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当时在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不仅仅包括选编怎么选,而且包括哲学史怎么写,都有很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写哲学史就是把资料客观地、原原本本地摆出来,而且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也出了几本这样写成的哲学史,像人大出的基本上就是摆资料的哲学史,复旦出的全增嘏的那个本子不完全是摆资料,也有些观点,但是那些观点是陈旧的。要么就用旧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来处理这些资料,要么就完全不用观点来处理这些资料。

当时我们提出来,既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处理资料,也不可能完全不用观点,而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你写哲学史嘛,没有哲学的观点,你不是一个哲学家,怎么能写哲学史呢?当然国外有,有些像梯利呀这些人写的哲学史,就是大学教授的哲学史。所谓大学教授的哲学史跟哲学家的哲学史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摆资料,而且他了解在历史上哪些哲学家曾经被看作是重要的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一种知识性的哲学史。你读了我这个哲学史,你就知道,西方哲学史上有哪些哲学现象出现过。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哲学史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史。哲学家的哲学史有两个代表,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他完全把这些哲学史料融化为他自己哲学观点里面的一个环节来加以阐述。再一个就是罗素。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很精彩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为什么能得诺贝尔

文学奖？因为它文采飞扬，而且里面的机智，嘻笑怒骂，不受任何拘束，他就是他，你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面可以看出罗素。他讲任何一个人，都表现出是他罗素在那里说话。这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他用自己的哲学观点来褒贬、评价所有哲学史上的人物。当然罗素的那种写法可以得文学奖，但是他不见得能够得哲学奖。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呢，他带有某种哲学家的片面性，他的哲学是片面的真理嘛。黑格尔的哲学当然也是片面的真理，但是黑格尔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尽量能做到用自己的哲学观点去把客观精神的历史、客观思想的历史揭示出来。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史也有他的偏见，也有他的片面性，但是你可以从里面把握到人类哲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你要从罗素的哲学史里面把握规律性那是不可能的，它没有什么规律，就是罗素站在他自己现代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上面来衡量，他用一杆标尺来衡量这个哲学家不行，那个哲学家可以，某某人有新的发现，都是用他的标准来衡量的。莱布尼茨，那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数理逻辑的先驱者嘛，罗素就是搞数理逻辑的。所以，他完全是用自己的片面的立场来褒贬。这个在黑格尔的术语里面叫做“反思的哲学史”，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去褒贬历史上的人物。至于历史上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在客观上、在人类思想史上处于哪个阶段，这个他不管。他骂的那些人，在他看来那真是要不得。要不得的你为什么要写出来呢？你不写出来不就得了吗？他要写出来，不写的话他就没有文采了，他要骂他们。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黑格尔的这种哲学史，我们下一次就要谈黑格尔哲学史观，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里面的导言，它体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这个哲学史观在黑格尔以后，没有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看出了它的价值，并加以推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出一部哲学史来，后来的人也没有人继承，从黑格尔以后就成了绝学。但是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出，他想要搞的东西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来尝试一下？我跟赵林老师编写的《西方哲学史》里面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再一个是因为是给本科生写的，不可能写得太长，不可能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动不动就是多卷本，那谁买得起呀！所以我们尽量地压缩，压缩成了35万字，我都嫌多了。我当时的计划是把它压缩到30万字以内。但是后来因为赵林老师那一部分写得太多了，我拼命地砍，他写的那部分还是比我的多。我们在里面尽量地想要带一点这个意思，就是把哲学史写成人类的哲学思想一个接一个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历史。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他接受了前人的哲学思想以后，觉得还不够，觉得还有矛盾，解决不了，于是他又提出一种观点，试图把它加以解决，于是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那么后来的人也是这样，人类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类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文化和文明的整体，人与人的思想是互相影响、互相提携、互相促进的。你不要把它看成某个哲学思想就是哪个天才脑子里面忽然蹦

出来的,不是的,他从小就要受教育,哪怕他是天才,他也有一些前提。他没有受过教育,那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和整个人类文化精神融合于一体。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他一定的道理。当然我们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相信这就是一个上帝,这就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神,地上的神,在那里行进,我们不能那样去考虑,但是我们从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总体性方面可以承认,人类的思想是体现为一个整体的。

所以哲学史应该这样来写,把人类的哲学思想看作一个整体,凡是能够促进人类哲学思想的,他在人类哲学史上就会留下一笔。如果你不能够促进,你只是凭自己的天才,你跟其他人无关,你提出来一个东西,那么,你怎么就知道别人就不如你聪明?别人可能也提出过。而且你提出的那个东西很可能就在别人提出的范围之内。人家早就解决了,或者人家早就想到了,人家比你想得更宽。所以那种东西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在哲学史上是留不下来的。不管你多聪明,如果你不了解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面你去发挥你的天才,那么你那个天才是浪费了的。你在人类哲学思想的层次底下去发挥你的天才,那你不是浪费吗?你做人家已经做过的事情。不管你多么有天才,人与人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把哲学史看成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一个接一个。

所以,1996年当时的会上我就提出来,我将来要写一部哲学史就要这样写,就是要把它写成人类哲学思想发展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一个逻辑过程。这个逻辑当然不是那样的死板的,它可能有跳跃,有的人也可能超前,超越了他的时代,在一定的程度上面超越时代是可能的。有的人特别有天才,他预见到了一些东西,想的可能比别人超前不止一步,而是超前两步、三步都是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有个规律性,不可能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我们今天的解释学呀,现象学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呀。当然我们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一个低层次,你可以从里面挖掘一些思想出来,但是当时的人不一定就有你那种思想。这是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后才可能有今天现代哲学这样一套理论。甚至于可以当代哲学为例。我当时在会上提出来,当代哲学有没有规律?当代哲学看起来五花八门呐,各说各的,特别是后现代以后,多元化以后,你哪里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个规律出来,找到一个逻辑出来?你不是把当代哲学思想定死了,成了标本了?那不行。会上引起很多人反对,说那怎么可能。他们认为至少从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写出规律来了。但是我尽量地还是想,从黑格尔以后,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思维方式至少作为一个尝试,来贯彻一下。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也有一个逻辑在里头。为什么从胡塞尔就发展出海德格尔?为什么从海德格尔又发展到后现代、德里达、福科这些人?虽然他们自己认为是多元化,没有任何规律,没有任何理性,就是从脑子里面蹦出来的,但是我们作为哲学史的研究者,还是要试图从里面找出某种规律性的

东西。比如说,哪怕后现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理性、反人性、“人已经死了”,是不是真的?你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其实他们在提倡一种更高的理性主义和人性。过去的人已经死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那种人已经死了,但是现代的人诞生了。现代的人诞生了是不是就成了动物了呢?显然不是。还是一种人嘛,一种更高层次的人。这种更高层次的人肯定是近代以来人的理想的进一步的深化,进一步的发展,没有这个前提,现代人难免不堕落为动物。

所以,这里头还是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跟在西方人屁股后头,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一句,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分析。我当时就说,有一天说不定我会写一部当代哲学史,把这些人都按照秩序纳入进去。大家都笑,都说你这是痴心妄想。当然我现在也没有拿出来,但是我还是有这个想法。从那以后,我开始写一部《西方形而上学史》,写了古希腊部分,但是一直放在那里了。我的计划是很大的,想要一直写到当代。形而上学嘛,西方当代人也讲形而上学,有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嘛,他们对形而上学怎么看,西方现代、后现代是不是就是把形而上学完全 pass 过去了呢?不可能的。形而上学是西方的传统,他们绝对摆脱不了这个传统。以各种形式,哪怕是反形而上学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又粗又大的传统。

这是那个会议上的一个争论了,当然不光是在那次会议上面,在此之前已经有争论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就开过会,我没去参加,就有过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外一些人就认为,不需要任何什么观点和方法,你就把人家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你的翻译没有错就得了。人家搞的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用方法?你的方法用在什么地方?你先得把人家的东西搞过来,搞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根本用不着方法。搞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人家那么多东西,已经研究到那样的高度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趁早死了这条心,不要在这方面去追赶。人家搞一点,你就把它介绍过来。这是在此之前已经有。在此之后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争论。这是两种倾向。

那么这两种倾向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下。实际上方法论的缺乏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传统弱点,我们不重视方法。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不重视方法,我们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从来都不重视方法,都不重视方法论。方法,我们也讲过文章学啊,怎么做文章啊,八股文呐,怎么样遣词造句呀,但是缺乏方法论,从来都不重视方法论,不重视认识论。我们已经能够把握到了这个文章怎么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考察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做这个文章有没有一个“论”?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太讲究。要讲到这方面,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我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文章有方法,但是没有“方法论”。没有方法论,就说明我们这个层次没有办法提高。当然有些东西是没

有办法讲方法论的,比如说小说怎么写呀,诗怎么写呀,这个是没有办法讲方法论的。你讲的那些文艺理论都是隔靴搔痒,当然还需要自己去操练、去实践、去体会。你读多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嘛,你搞多了你就慢慢入门了,入门以后能到哪一个层次就看你的天分了。所以这个方面不可能有方法论,但是学术应该有方法论。

比如说政治学、伦理学、道德等方面,你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得出来的。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你那个道一以贯之是怎么样贯的,他不说,反正你自己去体会,我讲那么多话,你可以看出里面有一个道在贯穿,但是它是怎么样贯的,在方法论上怎么样来理解,那个没有办法说,只有你自己去体会。所以,老是把方法论的问题归结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使我们的思维层次受到了阻碍,使我们的哲学层次受到了阻碍。所以讲到方法,我们历来的学术方法就陷入到了考据呀,音韵训诂啊,顶多就是分类呀、编纂学这方面。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嘛。经史子集的分类其实是很粗糙的,是不严密的。什么是经,什么是史,什么是子,子里面有很多就是经典嘛,但是出于儒家偏见,它们只能归于“子”。这样的分类是非常粗糙、非常表面的分类。如同中医里面的药材分类,这个药是凉性的,那个药是温性的,凉性的里面有矿物类,有动物类,有植物类,都混在一起,它不管你客观上是什么类,他只管我这味药是用来治什么毛病的,就把它归到某一类。但是治什么毛病它又没有确定的分析,而是凭体验。所以中国有方法而无方法论。他告诉你一个方法,你造一个房子,叫你背一个口诀,这个梁怎么样,这个柱子怎么样,这个瓦又怎么样,等等。多少尺寸,有的还编成歌唱。农村里的木匠学徒,学三年徒,学徒无非就是打洗脸水呀,烧火啊,干这些活。到了最后一年要出师了,师傅教他背一首口诀。这一般是不传出来的。你知道了这个,你就知道怎么盖房子,怎么打桌子、椅子,尺寸都在里头。这就是方法。但是有没有方法论呢?没有。所以它是不合逻辑的,也没有系统。

那么我们今天讲哲学史的方法论,我们不能够背一套口诀。怎么写哲学史,我们必须要有论。哲学史当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历史。别的东西你可以看作是历史,唯独哲学史你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历史,它更是哲学。这个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里面强调得很厉害。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上的那些哲学家,他们的观点,在哲学体系里面要占据他们固有的一个环节。不是说,你零零星星地把那些东西收集拢来凑到一起就是哲学史了。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你收集不完的,你几辈子也收集不完。我们今天看到的哲学史,是经过几代人不断地淘汰,有些把一些人纳入进来了,后人又觉得不合适,这个哲学家没那么重要,写不了嘛,你写哲学史总要有个篇幅嘛,所以不断地淘,大浪淘沙一样,最后淘剩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些哲学家。那么在黑格尔看来,这些哲学家之所以能够剩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哲学体系里面占据一个